

# 近代江南茶馆与乡村社会运作

朱小田

茶馆是近代江南乡镇最基本的物化人文景观,以此为视点,可以阐释乡土中国独特的运行规则。本文提出,在乡村社会的运作中,江南茶馆是乡村市场的结点、社区政治的焦点和闲暇生活的热点。作为乡村市场的结点,茶馆交易主要采取贸易洽谈、直接成交、信息猎取三种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交易主体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势,反映了地方市场的落后性;作为社区政治的焦点,茶馆体现出暴力政治、契约政治和继替政治三种政治生活方式,反映了近代社区民间政治的特点;茶馆所以成为闲暇生活之热点,在于它满足了乡村人独具特色的社交、休闲和表意的需要,并表现出阶级性、教化性、庸俗性等特征。

作者:朱小田,男,1963年生,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 一、乡村社会之视点

茶馆,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社会,而江南的茶馆以其独特的社会意义格外引人注目:“江南,哪个较大的城市与集镇上没有这样中国的俱乐部?把吃茶看成一种了不得的罪恶,或者提到苏州人,就联想他们的游惰生活,上茶馆居其一。”<sup>①</sup>在江南,确实有许多城市“闲人”,终日孵泡茶馆,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固定模式,“甚至于乡下人也把一半可以工作的时间,耗费在茶馆生涯”<sup>②</sup>,以至“友朋初晤,辄问何处吃茶。”<sup>③</sup>但是,如果仅仅把茶馆作为“游惰”的同义语,未免失之肤浅;本文以茶馆为透视点,从一个侧面刻画江南乡村在近代社会中的独特运行方式,阐释其运作规则。

江南乡村,茶馆林立。乡镇每条街上总有几家茶馆,俗谓“没有茶馆不成市”。湖州南浔镇,抗战前茶业最盛时,有50家茶馆之多。据1951年商业调查资料,全镇尚有各式茶店、茶灶、茶馆、茶园、茶室31家,日供茶水高达45900多碗。<sup>④</sup>

江南乡村茶馆一般集中在乡镇上。乡镇茶馆的普遍存在,是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与江南社会特定历史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战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很快演变为带色彩的地主制经济;地主制经济的特定形态,造成了自然经济必须以商品经济作为构成要素<sup>⑤</sup>。明

① 秋文:《坐茶馆》,《盛京时报》1936年6月21日。

② 陈醉云:《姑苏散曲》,《东方杂志》第30卷,第8号。

③ 沈云:《盛湖竹枝词》卷下,第7页,1918年刊,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④ 《南浔镇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24页;张公鹏:《闲话镇人喝茶与茶馆》,《南浔通讯》(内部发行)第108期,1996年。

⑤ 参见李根蟠、魏金玉等学者关于这一问题讨论,《中国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

清以来,江南社会的商品经济特别活跃,不断勃兴的各层次乡镇构建成网络。乡镇是市场的载体,为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作为服务行业的茶馆亦随之兴盛,成为一个乡镇的最基本的物化人文景观。无锡茅塘桥,其镇之小,仅有6家商业行店,但茶馆却有3家。<sup>①</sup>近代江南乡村,在国内外现代化大工业产品的冲击下,作为主要家庭手工业的棉纺织业和丝织业渐趋衰败,但小农经济结构却表现出极大的韧性。生存的压力迫使农户改组家庭手工业,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种特色产品。被迫改组后的农民家庭手工业与市场的联系更紧密。江南乡镇及其作为表征的茶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存在和发展动力。嘉兴钟埭镇,原先“织布业甚发达,近年来一落千丈。篾席、竹器等类业为特色,商店以南货为主,茶馆三十家之多。”<sup>②</sup>即使在死抱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新行镇,茶馆亦不稍逊:“男女多以织布为生,茶馆和酒店合计在八十家以上。”<sup>③</sup>

林林总总的乡村茶馆,种类庞杂。从时间上看,除长年茶馆外,还有季节性茶馆,如暑天里的风凉茶馆、庙会时的茶亭;<sup>④</sup>一天之中,有早茶、午(中)茶、晚(夜)茶。依主人分,有夫妻、社团、帮头等。<sup>⑤</sup>从功能讲,可分为交易型、休闲型、社会型或综合型。此外,还有所谓清茶馆、荤茶馆之说。<sup>⑥</sup>

所有这些,只是乡村茶馆的表象,在简陋的设施和喧闹的人群背后,折射出乡镇经济的荣枯,社区整合的强弱,人情世态的炎凉。

## 二、乡村市场之结点

所谓结点,又称结节点,是具有结节性的地点。这里的结节性,指的是,在乡村社会里,乡镇对其“乡脚”<sup>⑦</sup>的吸引力,这是集聚经济效益规律的作用。茶馆聚合了不同行业的社会角色,所谓“往来三教九流客,进出五湖四海人”。<sup>⑧</sup>这样,茶馆所拥有的顾客和信息成为农民和工商业者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源,“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卖与买”。<sup>⑨</sup>这里是乡村市场的结点。

茶馆在乡村市场中具有明显的区位特征。明清时期,江南乡镇在镇沿通常设有栅栏,称为“市栅”。随着市场的推进,与农产品的征收和买卖关系密切的商行和租栈多设于市栅,如“桑叶行,开在四栅近处,以利船出进也”。<sup>⑩</sup>苏州乡镇市梢上,每每有地主征收地租的“堂栈”,“栈”的门前,又每每有埠头,可以停泊粮船。<sup>⑪</sup>商行和租栈的分布格局,使市栅茶馆洋溢着更浓烈的商业氛围:“茶店为乡人聚集之场,关系市面甚巨。……西栅茶店都为乡农出市叙集之所,故只乡航到时座中客满。……同乡人出市非至茶店息足,即在酒肆休息,市面因之热闹。”<sup>⑫</sup>

① 陈枕白:《二十年无锡见闻》,《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100页。

② 《嘉兴一瞥》下册,1936年。《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内部发行)1985年3月,第60页。

③ 同上。

④ 顾友云、缪介夫:《杨舍茶馆史话》,《沙洲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⑤ 社团开设的茶馆,如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附设的茶室;常熟杨舍镇得仙园茶馆就是清帮头子陆瑞庭所开。

⑥ 《茶馆儿》,《盛京时报》1936年5月9日。

⑦ 所谓乡脚,是江南地方志中的特定概念,指的是乡镇所直接影响的周围村庄,其意义相当于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经济影响的范围”(Economic Reach)。

⑧ 顾友云:《杨舍茶馆史话》。

⑨ 温丰:《南浔镇丝市行》(道光),转引自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74页。

⑩ 《濮院志》卷14,“农工商”。

⑪ 陈醉云:《姑苏散曲》。

⑫ 《乌青镇志》(民国)卷21,“工商”。

在茶馆进行的商业活动,大致有三种形式:

1. 贸易洽谈 江南乡镇茶馆的交易依行业不同而具不同的交易内容。抗战前,在长兴城关镇的“三箬居”,掇客撮合破落地主和地主富户,进行房地产交易,故长兴有土语云:“若打官司卖田地,请到衙门前面三箬居”。“四面厅”的主要顾客之一是绅缙文人,城区的裱装书店,如“翰墨林”、“惜墨斋”、“藏甘斋”的老板,也经常前去接洽业务。外来的书画家,来长兴展销作品,也都在“四面厅”会见当地名流。长兴的书画收藏家,不时前去购买作品。<sup>①</sup> 这里成为长兴书画艺术交流和金石书画的推销场所。而盛泽茶馆业务的行业特点非常鲜明,贸易洽谈的主要是土丝、丝经、绸匹的交易。<sup>②</sup>

2. 直接交易 昆山的茶馆类似劳动力市场,“茶坊亦各有以某行当相聚而饮早茶,以例于应事主之聘请召唤,如道士、鼓手、缝纫、泥水木工及当时称脚班之搬运装卸工等,此类人物,聚叙茶会,以应临时雇用,生活实赖之,饮茶者非优闲也”。<sup>③</sup> 平湖的新镇南桥楼茶馆的底层茶台,上午都为渔民占去,出售鱼、鳊、虾蟹,成为水产品交易市场。<sup>④</sup>

3. 信息猎取 茶馆商业信息对农家颇为有用。江南农民散处四乡,为了克服分散性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一部分人利用定班航船进镇买卖,一部分人干脆就把交易活动托付给了航船主。航船制度“在太湖周围地区非常普遍”。<sup>⑤</sup> 据记载:“大约每晨由各乡村开船来镇,中午由镇返乡。到镇后即步入茶馆。茧、丝、新米上市时,乡人即以此地为探听市价之所,因而经营茧丝米及其他产品之掇客,亦往往出没于其间,从事撮合,赚取佣金。”<sup>⑥</sup> 乡人在此“探听市价”,掇客在此提供有偿信息服务,各取便利。

茶馆商业信息往往随季节的转换而转换内容。蚕茧上市,茧行开秤,茧价就是茶馆里的中心议题。<sup>⑦</sup> 吴县洞庭西山盛产梅子,由镇夏街上的山地货行收购。每到梅子上市季节,“桥墩下那片茶馆里已坐满了一屋子乡下人,在悠闲地喝着茶,高谈阔论一些山地货行市,农村新闻。”<sup>⑧</sup>

在茶馆交易中,交易主体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势。江南米商特别注意市场粮价涨落和供需情况变化,开“茶会”是他们掌握市场信息的主要方式。抗战后,江阴澄江镇“茶会”设在北门外,每天上午,粮商聚集在这里饮茶,洽谈生意,从中获取信息,形成定例。这里是米业信息源。在盛泽这样的丝绸大镇,茶馆信息一般是丝绸贸易行情,俗称“临市面”。<sup>⑨</sup> 有时,乡镇商行就利用这样的信息,翻云覆雨,操纵市场,使米价、叶价、茧价等涨跌糜居。濮院叶市凡三市,“每一市凡三日,每日市价凡三变。”<sup>⑩</sup> 在乡镇茶馆中,人们经常看到,被抛入了市场漩涡的乡民为打听商业行情而削尖了脑袋:“中年的叔伯们,探听米价的贵贱,菜价的涨落,正像投机家做‘买空’‘卖空’般一样的关心”。<sup>⑪</sup> 农产品的原始市场和商业资本相结合,肆虐一时,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地方市场的落后性。

① 严济勋:《昔日长兴茶馆》,《湖州文史》第8辑,1990年4月。

② 《吴江风情》,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02页。

③ 庞寿康:《旧昆山风尚录(续选)》,《昆山习俗风情》(内部资料),1994年1月,第37页。

④ 《平湖供销社》(内部资料),第184页。

⑤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⑥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转引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280页。

⑦ 《茧行》,《申报》1937年6月7日。

⑧ 方舟:《山地货行》,《申报》1936年6月9日。

⑨ 周德华:《桐乡话茶馆》,《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92年1、2合辑。

⑩ 沈廷瑞:《东畚杂记》,《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第152页。

⑪ 茸余:《小茶馆里》,《申报》1934年5月18日。

### 三、社区政治之焦点

对于江南乡村的政治体系来说,乡镇构成一个基本单位。作为乡村社区权力结构主体的官绅和工商业家,以镇居者为多。<sup>①</sup>无锡梅村镇“有五分之三以上是几个大地主所有”。<sup>②</sup>近代,宗法封建专制政治已是强弩之末,但它的每一根触须还深深扎入乡镇。镇居各种势力,或各自为政,或几位一体,或相互勾结,织成复杂的社会之网。这些“乡镇上的人物”,活跃于茶馆,左右社区事务:

王太爷在亡清是位秀才,……在本乡是个地主,拥有田数百亩。

镇上有几茶馆,是王太爷的办公处。他镇日独据一桌,住在那里,高谈阔论:不是说捐税太苛,定是说人心不古。……他憧憬唐虞三代之盛,他痛恨这用夷变夏之非。他无嗜好,喜吸皮丝恶卷烟。他骂外国货。……他会断家务事、钱债。他的说话比法院里的判决书还有效,因为他能根据圣经贤传,亡清律例,正颜厉色地把人说得不敢不从。他又会替人家做状子,报酬看事情大小而定,虽然还说不上包打官司。

王太爷待人接物,是颇有分寸的:对催租委员是一种颜色,对乡警或乡长之类又是一副脸孔,至对佃农及有求于他的人则又是一副架子。<sup>③</sup>

这位颐指气使的乡绅在封建正统文化沉积的基层乡村,纵横捭阖,举凡家长制度、宗法观念、以权代法、腐朽愚昧,集于一身。在这里,茶馆政治实际上就是阶级的暴力政治。

“吃讲茶”是契约政治形式:它是社会冲突之一种,甚至还伴之以武力炫耀,但并不具有阶级压迫的性质,因为它是同一阶层的人们相互认可的解决民间纠纷的方式。“吃讲茶”是个切口语,“朋友”之间,略有纠纷而不能立时解决,就“吃讲茶”了。它含有“讲”开算数,“茶”以敬客之意。因为约定的地方,多半是双方常去的茶馆之类,故名。不难看出“吃讲茶”的原意并不坏,而且是极端和平的方式,要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sup>④</sup>浙江德清的“吃讲茶”盎然着这种“古意”。凡民间纠纷,当事人约定于茶馆调解。众目睽睽之下,双方和风细雨,竭力申述,当众仲裁,理亏者付茶钱。<sup>⑤</sup>在晚清的上海罗店镇,“吃讲茶”也很合法式:“俗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sup>⑥</sup>

但是,“和平政治”后来并未延续下去。民国时期,在江南乡村茶馆里,这样的场面屡见不鲜:

有几个人围坐一张台上,放大了喉咙,你一句我一句的说个不休,这就所谓“吃讲茶”。乡人有一种脾气,有争吵的事,动辄上茶馆评理,一言不和,大演全武行,拍台击凳,抛壶掷杯,没有旁人调解,战争决不停止。所以茶馆的台凳壶杯,有缺角的,跛足的,残破不堪,就是这个缘故。<sup>⑦</sup>

因为以武力相加的“吃讲茶”相悖于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常常让邪气甚嚣尘上。民国元年,昆山地方封建势力盛行苛税“庄书”,江苏省议员蔡璜力革弊改,废除庄书。一帮人以“吃讲

① 参阅《苏南土改文献》,1952年,第497—498页,苏州档案馆藏。

② 倪养如:《无锡梅村镇及其附近的农村》,《东方杂志》第32卷,第2号。

③ 拾玖:《王太爷别传》,《申报》1936年6月2日。

④ 析规方:《怎样应付“吃讲茶”》,《申报》1936年9月20日。

⑤ 蔡泉宝:《德清的茶馆》,《德清文史资料》第4辑,1993年2月。

⑥ 《罗店镇志》,卷1,风俗,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⑦ 钟岳:《乡茶馆》,《申报》1936年8月31日。

茶”为名，对蔡璜大打出手。<sup>①</sup>

如果封建势力与社会渣滓掺乎其间，事情更为复杂。胡川如先生对民国时江阴乡镇的“吃讲茶”描述道：

市镇上有些吃饭无正事管的人，遇到农民有什么争端，要请乡董判断的时候，总从两方游说，教他们这样说，那样行，趁此机会，就在点心站里大吃而特吃，鸦片铺里大吸而特吸。农民听了帮他的说话，那得不感恩，恩人吃的点心鸦片等费，自然一齐替他会帐。有时还要替他还欠帐哩！……乡董的法庭，都设在茶肆里，泡茶没有几十壶，茶钱倒要三四块钱哩！这茶钱是理曲的人出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结果农民请市镇上一班人喝几口茶，抽几口鸦片，而于实在事情，仍没什么了结。<sup>②</sup>

这一幅乡镇社会风俗画，形象地向我们传诉：这就是乡村民间的政治！

茶馆政治的第三种形式，是继替政治，它发生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继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以后，1934年江南大旱，1935年又是一个旱年。乡村人本能地感到恐慌，茶馆里忧心忡忡的表情和叹息，加剧了这一大众行为：

去年荒了一年，乡下人已经去掉了大半条命了，弄得到秋末还得掘山芋来吃。要是今年再一干，要是今年再一荒，要是这几天再没有雨呢……<sup>③</sup>

人们没有想下去的勇气了。路在何方？费孝通先生认为：“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sup>④</sup>我们称之为“继替政治”。当是时，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威胁，“继替政治”的表现形式是形成比较一致的公众舆论。社区“意见领袖”的出现是舆论形成的关键，于是，又是在茶馆中：

一个老年人，额上堆着乱草一般的皱纹，脸是枯瘦而黝黑的，仿佛念着可怕的咒语似地张着嘴唇，吐出不清楚的音节：“田地吗？可真没有用啊！守着也是等死啦。年纪老了，要是我年纪还轻，也像你们那样的小伙子一样的，我老早就跟你们天南海北地浪出去了。横竖这年头什么都难做。浪出去，也许可以浪出一个局面来，顶少也可以多见识点世面呀！人连饭都难弄到手，还讲什么安逸，出去像水鸭一般地飘着，不也好吗？”<sup>⑤</sup>

求生的，流浪的，中世纪海盗式的气氛笼罩着茶馆。当政府疾呼着“救济农村”的时候，乡村政治生活之轮就以这样的方式运转着。

#### 四、闲暇生活之热点

茶馆所以成为闲暇生活之热点，在于它基本上稳定地满足了乡村人独具特色的闲暇生活需要。

首先，社交的需要，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际之间的交往。乡村社会，人口分散，交往圈子狭窄；乡镇，尤其是乡镇茶馆，人口相对稠密，信息相对集中，满足了乡民的交往需要。在乡村茶馆中，虽间或涉及诸如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天下为公、棋琴书画等高雅话题，是为清谈；<sup>⑥</sup>

① 谷稼：《地方劣俗》，《昆山习俗风情》，第183页。

② 胡川如：《各地农民状况调查·江阴》，《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

③ 克明：《村里逐鼓》，《申报》1935年6月20日。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6月版，第68页。

⑤ 克明：《村里逐鼓》。

⑥ 乘黄：《嚼茗趣谈》，《申报》1929年5月10日。

但更多的是流长飞短的荤说，“有的讲昨天的赌局，打出了一张什么牌，就赢了两底；有的讲自己的食谱，西瓜鸡汤下面，茶腿丁煮粥，还讲怎么做鸡肉虾仁水饺；有的讲本镇新闻，哪家女儿同某某有私情，哪家老头儿娶了个十五岁的侍妾；有的讲些异闻奇事，说鬼怪之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sup>①</sup> 茶馆老板对此更为津津乐道，什么，“东村李婶子，好轧野汉，昨晚给丈夫双双揪住。西巷的王阿毛，喝醉了烧刀，在坟头上睡了一夜，今天大发寒热，怕是被野鬼迷住了”。<sup>②</sup>

这些社会新闻的传播者，擅长使用非语言符号，特别是体语来吸引听众，称为“唱新闻”。<sup>③</sup> 从语言的角度分析，这些社会新闻的叙说，推论和判断多，客观报告少，主观性非常强。茶客当然也是姑且听在耳里，随便传播开去。

江南乡村的人们，就在这种传播和交流中，获得了莫名的满足。有论者精辟地揭示了茶馆人际交流的社会意义。

类如这些不是一个人的，而愿合起众人的会聚，除却他们专有的因素，是音乐的激动，喜怒的表现，谈话的多方趣味，交易的需要，迷信等等之外，我仍然武断的说，他们都多少有点社会意义，假如一个人看戏，一个人在市上选购物品，一个人做赛会的观念，怎么样？……果有这等事，他一定意味索然，赶快向回头跑。世间的一切，“独乐”两字能通用，即在独乐，也觉得有天地茫茫之感。<sup>④</sup>

其次，消闲的需要。农夫们平时胼手胝足，难得有喘息的机会。说到娱乐，除了常常举行的庙会之外，最普通的消闲去处就是茶馆：

家乡（桐乡乌镇）的茶馆，可称是民众俱乐部。不论是“乡下人”，是“街上人”，对于上茶馆，都感着极浓厚的兴趣。固然上茶馆的人，也有约会着谈正事的，也有相聚着谈生意经的，不能说完全是为消闲起见，然而并无目的，专以消闲为事的，却要占着大部分。有许多人，竟是一天到晚，度着茶馆中的生活。从这种地方，吾人可以见得乡镇人民确乎比较都市人民，来得闲适，可以占着一个“逸”字。<sup>⑤</sup>

显然，城里人把乡村茶馆作了理想主义的想象。实际上，茶馆给乡民们带来巨大快乐的，主要不是偶尔闲适，而是消闲娱乐活动。最常见的是听书。

在江南乡村，书场一般都设在茶馆，夜茶尤其如此。书场表演主要是苏州评弹，间唱滩簧。苏州评弹，本是江南城市市民的消费品，“历来苏州人有到茶馆喝茶的习俗，随着评弹的兴起，一些茶馆就兼营书场”；<sup>⑥</sup> 本世纪20年代，随着城市生活的近代推进，各种现代化娱乐手段次第出现，苏州评弹这种“带有大众色彩的地方艺术”，经历了一个由城市茶园向乡村茶馆的扩散过程。

近一二年来（30年代初），无线电盛行，几位光裕社头儿脑儿，顶儿尖儿的人物，都舍掉了书场，改往播音台。只不过要有产有闲的阶级，才置备得起无线电收音机，至于乡下茅草屋的小茶馆里，聚集了许多黄泥腿的乡下人，静悄悄地恭候着说书先生上台，一块醒木，一只弦子，是安慰劳苦大众的恩物；那里的说书，才是大众艺术，说书先生的报酬虽然菲薄，可是价值却超出专在播音台上侍候有闲的太太小姐们的所谓说书名家。<sup>⑦</sup>

① 叶圣陶：《生活》，《叶圣陶文集》第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茸余：《小茶馆里》。

③ 凤子：《消闲》，《申报》1935年5月13日。

④ 秋文：《坐谈茶馆》，《盛京时报》1936年1月28日。

⑤ 独鹤：《回家经后》，《新闻报》1929年8月7日。

⑥ 曹凤渔：《百余年来苏州市书场设置概况》，《评弹艺术》第9期。

⑦ 恂子：《在乡下听书回来》，《申报》1935年1月29日。

这一过程是艰难的：“据说那些不曾成名，或是新近出师的，才肯去到小码头上弹唱或者开讲，至于成了名的，是誓不肯再跑码头的了。”<sup>①</sup>苏州评弹的“下嫁”，提高了乡村人的余暇生活水准，因为，所谓余暇，虽被定义为能自由利用的时间，但在这里，人是处于用自己的热情实现自我、用创造性的方法表现自我的状况中的。

最后，表意的需要。乡村茶馆，为人们提供了感情的表达和释放机会，这在社会学中被称为表意。<sup>②</sup>农民们终日于温饱，生活枯燥而单调，同时又受着传统礼教的束缚，情感过于压抑。在茶馆中，则是另一番景观：

人—多，声音跟着嘈杂异常，面对面说话几乎不能听清晰，非把脖子提高不可，于是空气更加紧张而骚乱。人全像具有一颗来到此地需要尽情开怀，畅所欲言的心，人都是那样劲儿浓，愉快。<sup>③</sup>

按常情，表意群众的有些举动被认为不合规范，甚至是破坏性的。在这种场合，就给了人们一种感情上的松弛，这是在茶馆之外难以得到的。

江南乡村的茶馆闲暇文化表现了乡村社会的运作过程，凝结成如下规则：

其一，阶级性。在苏州城里，整日消磨在茶室中的悠闲阶级有一个特具荣街——茶博士。<sup>④</sup>在吴县乡下甫里小镇上，也有成天坐茶馆的上层阶级：

那伙人也曾念过点孔子遗教，守着祖产的田地，他们没有事情可干，就类集到那么一个适宜的地方，谈天说地的无为挨过一天，……你能设想他们的人生观吗？要说他们的人生观那是不成话的。在那环境里像对于人生的意义是没有人追求过，人只要吃饭，游玩，娶老婆，生儿子，一直糊糊涂涂到死，就完了。<sup>⑤</sup>

这些乡下“茶博士”，虽然大都与乡下老百姓共处一馆，但各级茶客，自觉地分流入座，不会僭越。平湖城厢镇的“易安居”有三进，第一、二进茶客以农民、商旅为主，第三进为雅座，有讼师、律师、新闻记者、富商绅士等。<sup>⑥</sup>当然，一般的茶馆都有一些基本茶客，简陋的乡邦茶棚在“茶博士”眼里自然是一流的。

其二，教化性。在江南乡村茶馆里的评弹书目，无非是《珍珠塔》、《杨乃武与小白菜》、《玉蜻蜓》、《英烈传》、《岳传》、《双金锭》、《孟丽君》等，茶馆书场断档的时候，主人也邀请一些说唱艺人，演出“小唱”、“清曲”或“说因果”等，其内容不外乎“闺阁千金有宿缘，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御赐结婚大团圆”之类，充满了轮回报应，因果循环等说教。

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农民阶级的思想也只能是统治阶级思想的翻版：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乡村茶馆这块跳板，潜入农民的心田。士大夫精心设计的僵硬的纲常伦理，被融泡在“一杯一杯复一杯”的茶水中，滋养着乡村人：

农人见闻陋隘，感觉简单，受戏剧之潜化力为最易，豆棚茅舍，邻里聚谈，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多举戏曲上之言词事实，以为资料，与文人学子之引证格言历史无异。<sup>⑦</sup>

其三，庸俗性。这里且不论茶馆里不时出现的淫邪儇薄的小曲艺<sup>⑧</sup>最能说明茶馆余暇生

① 恂子：《在乡下听书回来》，《申报》1935年1月29日。

②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59页。

③ 家人：《茶馆及其主人》，1936年2月22日。

④ 德邻：《苏州的茶博士》，《申报》1937年1月19日。

⑤ 沈圣时：《甫里通讯》，《申报》1934年6月4日。

⑥ 岳士明：《旧时茶馆杂录》，《平湖文史资料》第4期。

⑦ 高劳：《谈屑·农村之娱乐》，《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

⑧ 茶馆曲艺中的大部分，充满了乡土气息和农民情调，是为土俗，不是庸俗，但也确有迎合低级趣味之作。

活庸俗特征的,是炽盛的赌风:

乡村上设小茶馆,已经是奇怪了。……为什么日夜雀牌声不绝,一切万恶事情,都从小茶馆里做出来,唉!好好几个农民,被小茶馆引诱得一丘之貉。——店主人一定利市十倍,而一般好赌者,以为可以乘机鱼肉,如蝇蚋逐粪,影响所及,为害非浅。……自从有了小茶馆,日以继夜的赌,有几个赌兴方浓,精神疲惫,不得不思抽筒大烟……<sup>①</sup>

类似的记载可谓俯拾皆是,民国地方政府多次严行取缔茶馆赌博,结果总是收效不大。其症结何在?直至今日,人们仍在苦苦思索。

## 五、余 论

近代以来,人们对乡村社会的理解常常走向极端:或者将其看作世外桃源,或者视为人间地狱。对江南乡村茶馆的实态考察,否定了这种绝对化倾向。在乡村,商行操纵与市场活力同构,自然隔绝与田野风月同在,暴力统治与和平契约并存,终日劬劳与社区娱乐互补。基于事实的这些辩证认识,启人深思:“罪恶和纯朴,黑暗和光明,绝不是都市和农村固有的特征,而只是一种社会体制所造成的病态的现象。”<sup>②</sup> 这就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根本依据。

对乡村社会的正确认识,也启迪了当代人的思维。有论者认为,城市与乡村是两种不同的社区形式,从生产发展的角度和人类生存条件来看,城乡各有利弊,两者并不是人类理想的居住区。乡村城市化过程就是要求城乡两极同时向对方的优点转化。<sup>③</sup> 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小城镇化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在建设现代化小城镇的过程中,乡村茶馆引发人们思古之幽情。1996年7月下旬,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开发科研究员斋藤美和子专程到南浔考察乡村茶馆。她以为:“南浔如果有一两家典型的江南茶馆,对经济和人际的作用都有好处,对近年建造的那些生硬的现代建筑材料堆砌的环境,也会起平衡作用。因为光有一些建筑群而没有不同层次的人际交流场所,一个城镇是没有活力的。”<sup>④</sup> 茶馆,这是民族的文化,但是,唯其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恐怕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寻根,而是在摸索历史与现代的榫眼。

责任编辑:范广伟

① 焕文:《乡村社会的目睹》,《新盛泽》1924年7月21日。

② 麦浪:《关于农村电影的一些偏向》,《申报》1924年7月20日。

③ 张小林、金其铭:《乡村城市化理论研究》,见崔功豪:《中国城镇发展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69页。

④ 寇丹:《异域口音说南浔》,《南浔通讯》第110期,1996年8月31日。